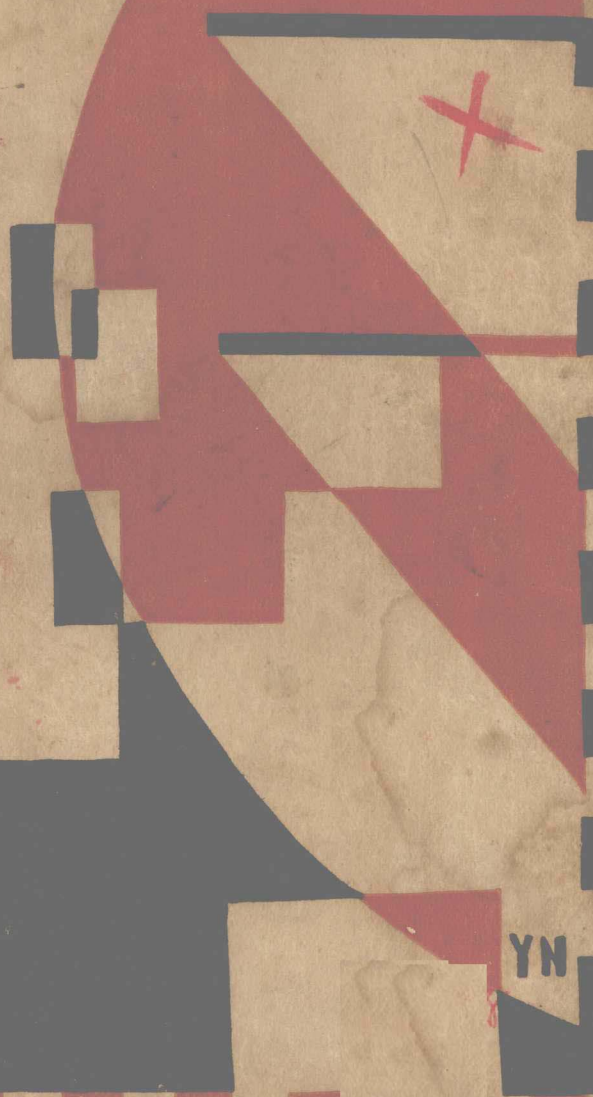


反利潤制度

華德善 陳澤譯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YN

原序

本書的產生實由於個人的需要。幾年來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在於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尤其是在於分析原動力這一點。一九二四年夏天，我到莫斯科去看看新經濟政策是否恢復到資本主義。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原動力顯然失敗了，所以當第一次五年計劃行將成功的時候，我需要找個機會到蘇聯去看看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否能產生一些對於人類社會的延續性更有希望的原動力。這機會終於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間來臨了。

調查的結果自然是時事的分析，沒有追述歷史的背景。就是在這結果的範圍內，並不是描寫全景，而是描寫主要的趨勢。這些趨勢之所以成為主要，是由它們在奠定製造機器的工業，社會化的農業，和普遍的文化的基礎上所得的成績的多少來證明。它們越來越流行，這在青年的態度，知識分子和農民對於社會經濟計劃的目的之增加援助上，更顯而易見。目前社會對於供給糧食和消費物的困難，在初期的時候早就見到，並且被輕視為『幼稚病』（Infantile diseases），它的補救法，現在已經知道，而又開始使用了。

論據（Data）和解釋，曾在列甯格勒，莫斯科，中央黑地區（Central Black Soil Belt），伏爾加區（Volga Region），六個橫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Trans-Caucasus Soviet Republic）中的四個共和國，

和烏克蘭(Ukraine)等區域得到。我們只顧旅行，大部分時間我們不是在旅館裏，而是與人民同住，因此得悉內部的情形。列甯關於過渡時代會產生創造性和組織的形態之預言以及斯達林對於黨的意見，假如不從行動上來觀察判斷，實無法解釋。

讀者應該永遠記得蘇聯的組織形態變遷得很快，因為現時一定當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代看待和統制。所以蘇聯不像我們所熟悉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政治結構那樣嚴格。始終一貫的事情乃是一般的趨勢和指導的原則，不過這些趨勢和原則也應該當做發展的過程看待。假如這一點不能明瞭，那麼蘇維埃的情形便難免被人誤會了。

本書所舉的例子往往是由作家記載下來的，而這些例子都是最能表現一般的趨勢。這樣可以利用的材料，為數頗多。因為限於篇幅，所以許多材料只好割愛了。關心的讀者可於莫斯科的英文出版物裏找到豐富的材料——如莫斯科每日新聞(Moscow Daily News)，蘇維埃文化批評(Soviet Culture Review)和革命文學(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我盡量不使用統計，因為統計變遷得很快，同時也因為以數量的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來解釋蘇維埃的情形，一定比任何國家為不充分。

我使用非常多引句，一來可以免避誤會的危險，二來可以供給有專門趣味的人以必要的詳情。常被引用的人是斯達林，他沒有當政府的職務，只是當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祕書；莫洛托夫，他是執行部部

長現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葉可克來夫，他是人民農業委員會主席，這一生產的部門是整個局面的關鍵。引用斜體字印刷，那些已經譯成英文的材料我沒有更動。

我沒有插入正確的材料參考書，因為這樣幹，對於那班不能利用俄文的讀者們似乎是炫學，而又浪費紙張精力。爲那班對於這問題有趣味的讀者的方便起見，我加了一張我所根據的英文材料。但是其中有許多種現在無法得到。

本書第一次使用俄文的字句時，我便解釋它們的意義，因為我覺得讀者看了上下文，比單獨一個字更容易記憶。大家也應該記得許多英文的相等字，在俄國的環境裏有不同的意義。譬如說，當國家管理工業農業的時候，『政府』這個名詞便有不同的意義，有時，舊名詞還會令人誤會現時的情形。

我對於許多人和機關深致謝意。全聯邦對外文化協會（VOKS 即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幫助我安排接洽私生活狀況；而且允許我利用它的月刊的材料。世界革命的文學，蘇聯外國工作人員合作出版社，和國際出版社的編輯諸君也給我以同樣的方便。我感激莫斯科共產學院勞動經濟學的教授克里味茲基君（M. Krivizky），他在預備付印時，讓我看他的材料。

那班給我以有效的幫助的翻譯家們，那班費了很多時間同時又喜歡答覆我的問題的忙碌的男女們，和那班曾在美國，加拿大，或奧大利亞住過，使我免却外國語的障礙的工人們，我都要深表謝意。

我尤其感謝郝克（J. F. Hecker）先生，他很慷慨地很諒解地把他的特殊的翻譯能力，他對於蘇維

埃的實力，事件，和人物的知識，以及他對於革命哲學的研究都聽我指揮。當他的革命哲學出版的時候，那班對於這問題有趣味的人就能夠得到更多的知識。

我最感激華德·達西·甘達爾 (Daisy Kendall Ward)。假如沒有她的陪伴，照顧，幫助，這材料便無法搜集；假如沒有她的建設的批評，本書也許不能像現在這樣子；假如沒有她的耐心的修正，只用我所有的時間從事這種工作，那我的原稿將不能很快地拿去付印。

一九三二年七月華德·哈來 (Harry F. Ward) 序於孫末塞特 (Somerset) 伏靈福特 (Flintfort)

反利潤制度目錄

原 序	一
第一部 轉變中的原動力	
第一章 舊時代過去了	一
第二章 形態的變遷	一三
第三章 新時代降臨了	七〇
第二部 羣衆的創造性	
第四章 社會主義勞動的新形態	八九
第五章 表現工人的創造性之其他方法	一五三
第六章 羣衆創造性的性質	一七八
第三部 統制的新形態	
第七章 社會主義的國家	一八二
第八章 黨與政府	一九七
第九章 黨與羣衆	二一九

第十章 社會的自制	二三五
-----------	-----

第四部 統一的推進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二五〇
-----------	-----

第十二章 文化與勞動	二七三
------------	-----

第十三章 文化的統一	三〇一
------------	-----

第五部 思想和理想

第十四章 革命的理想	三一七
------------	-----

第十五章 所根據的哲學	三二二
-------------	-----

第十六章 辯證法	三三二
----------	-----

第十七章 原動力的轉移	三五四
-------------	-----

英文參考資料	三七八
--------	-----

第一章 舊時代過去了

在人類社會悠久的歷史上——與星球相較則太短促了——經濟活動是基本的事實。人類其他一切的事業——愛情和戰爭，思想和夢幻——都依賴經濟活動，而且受它的限制。所以任何社會制度的權力和永久性，是看它有沒有維持工作的志願，以達到自己所希望的目標的能力而決定。資本主義之缺乏這種能力，現在已充分證明了。同時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基礎——重工業，發電所，用機械耕種的農業，和文化上的設備——由一個在世界上人口的數目佔第三位，內含一百五十個小邦，領土佔地球面積六分之一的國家，以空前的速度把它奠定了。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大區別，已簡括於組織工業只爲使用不爲利潤的議案中，或者，用倫理學的術語來說，以服務的志願來代替謀利的志願。實際上，這種變動自然沒有這麼簡單。原始的時候，那種驅使人類去活動的力量，恐怕到世界末日還會驅使他們。這些力量曾經人生哲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輪流分析過。一代至一代的變動，只是人類使用這些力量的形態，次序，和比例的變動罷了。所以，要明瞭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動力，必須知道他們正在消滅資本主義的那一種動機的形態，他們現在所使用的動機是怎麼樣，和他們發展什麼樣的新形態。

社會主義的思想是拒絕資本主義所憑藉的直接的經濟動機——希望謀利，害怕損失——因為這些動機有反社會的影響，而且使人類的天性弄墮落了。所以蘇聯的基本法律把這些動機當做惡魔，不讓它們有存在的餘地，實際上共產主義者絕不使用它們。

經濟的不穩定

擁護資本主義的人，總以為大富翁和日常勞動者應該為經濟災禍的可能性和恐懼心而努力工作。共產主義的思想家以為這只是對『市場上盲目的力量』不能或不願統制的那件事實作一種掩飾的遁辭。所以蘇維埃計劃經濟的第一個目的，是要使工人完全免却他們對於疾病和老年所常有的恐懼心。這種心理是緊追着各國許多工資勞動者的。靠着包括一切雇工和大部分學生的社會保險制度，工人得以免受工作和生活上的危險。一切費用都是雇主負擔，這與各處不很完備的制度正成一個對照。但是，既然雇主是政府的代理處或政府所統制的合作社，同時這兩個機關是由工人和為工人而組織成的，所以實際上有一部分公共的出產品，不拿來消費，而以完備的保險的技術，把它留作將來個人的急需。因此，危險用不着個人負擔，而把它共同分配到一切有關係人的身上去。因此，蘇維埃的工人用不着擔憂疾病、生育或死亡的費用。

失業津貼金的支付已取消了，因為蘇維埃的當局相信在計劃的制度下，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把失

業的問題永遠解決了；而且實際上這種支付，會使俄國的工人老是想遷移，這對於工業的效能上有嚴重的阻礙。所以不必像一九三〇年用五千萬盧布拿去支付失業津貼金，一九三一年的預算則加了一倍數目，以訓練新工業的工人。這種用於失業的消費，爲的是訓練那些職務所需要的稱職的工人，不消說是算建設上的費用。自然，蘇聯現在是沒有失業的問題，假如沒有國外資本主義的災禍阻止他們完成工業的設備和得到生產的效能，他們可以失業的惟一原因，便在乎分配勞工的不得當。集體化是統制工廠、農場間的勞工交換，免得從鄉村往城市遷移。合理化不會使工人變成懶惰，因爲生活程度的提高，更要求生產計劃的制度使市場的危機得受統制。一個在外國有多年經驗的熟練工人說：『以一萬六千萬人忙着供給彼此的需要，就是一百年間各人都有工做。』

蘇維埃的工人也免却那種常有的免職的恐懼心，這種心理各國工資勞動者們每天去上工時老是關懷着。職業所有權——社會主義的財產權利——只要與工業的效能相適合，可以保障它。在蘇維埃的勞動法裏，關於免職和預付免職津貼金的部分，有詳細的討論。它的條款也包括家用的工人、家庭工業、和季候工人。它打算『保護工人的利益，禁止不當的免職。』免職的自由權——許多資本主義的業主和管理者們以爲對於效能上很重要的——在蘇聯裏不能存在。只有工人真正缺少效能或者已證明有反社會的行動，才受免職的處分。不過五年計劃的緊急，使工人的行動受一般社會的統制，不必受雇主和雇員間形式上的權利和義務的統制。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把各種關係變動了，新的情勢便產生出自己的統

制的形態。這並不是因為勞動法有什麼正式的保護，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業的性質正在變動。這就是在蘇維埃工廠裏的美國工人所見到的第一種情形，當你問他們對於那種新的空氣有什麼感想的時候，他們說：『好，我不必擔憂職業的問題了。』他們所常說的第二種情形是：『萬一我發生什麼事故，我也不必擔憂我的家庭。』

在這新秩序下服務的從前的智識分子，也得到同樣的經濟的穩定，物質上的利益，文化上的便利，如今也公開給他們和他們的兒子了。年青的一輩不消說是出身貴族。因為做聯邦和共產主義的組織的成員，因為受過工人的訓練和經驗，他們有穩定的位置。他們在沒有畢業以前即分派職務，這與各處幾百萬個中等學校和專門學校畢業生的情形正成個對照。是的，他們中有許多人已經做過工，聊當教育的一部分。社會主義的建設，擴充了無限的經濟範圍給予專門技能的階級，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小範圍正相反。開往列甯格勒的船上有一位美國的鋼業建築的工程師說：『我在一個公司裏工作二十年了。最近六個月來，一到每月月底，我便給公司叫到辦事房裏去，他們告訴我們說，第二次付薪水時，他們不知道能否再用我們。』

集體農場的逐漸發展和成功，使貧農和中農的生活得免却經濟不穩定所生的恐懼心。他們現在以契約來載明他們所生產和出賣的東西的分量，價格，和品質。所以他們的收入可以根據成本會計（Cost-accounting）所做的計劃而決定，不必受市場的漲落的影响。同時，他們的危險，像工廠的工人一樣，現在

也分攤給各人了。有人問他們為什麼喜歡集體農場 (Kolhoz 卽 collective farm)，他們第一步就提出這種事實。有一個婦人說：『從前我的牛死了的時候，我正在生病。他們把牠（指牛）抬去田裏埋葬，我說：『他們也把我葬在那裏罷。』假如現在我有一個牛死了，我便用不着擔憂。我知道牛還有很多。』

經濟效能的增加，使農民們不必受自己的愚蠢和懶惰的束縛，好像他們免得受地主和富農 (Kulaks 卽 rich farmers) 金融上的束縛一樣。帶着盲目的力量的投機市場，讓給經濟活動科學化的組織時，經濟的不穩定就只縮到人類依賴自然這一點。

經濟穩定的責任既轉移到集體的組織上，有的人自然不肯努力工作。要克服這種缺點，必須教育，尤其是教育農民。在初期，好幾個公社須要剷除成員，因為他們以為共同生活有享受的權利，沒有工作的義務，或者是減少工作。第一次五年計劃的集體農場 (Pervaya Pyatileta Kolhoz) 的組織者說：『當我們於一九三〇年開始做集體化的時候，富有組織的例子不多，……大抵中農的工作做得很壞。他們對於集體農場的利益不很關懷，他們說：『這不是我的財產呀，——這是集體農場的財產呀。我為何要努力工作？』於是眼光的人便開始進行教育。當集體農場第一隊在刪除惡草的計劃的方面落後的時候，二百五十個工人中，只有八十二個是有用的工人，婦女們說她們應該有工夫烘麵包，農場的主席答道：『第一隊應該懂得我們的運命是在我們自己的手裏。假如我們還是工作得那麼慢，費了工夫去烘麵包，那麼我們不久便沒有麵包可烘，並且也沒有人肯拿麵包給我們……。早晨你們可以烘麵包，早餐後你們就能

夠來工作。你們千萬不要希望人家替你們做工。現在沒有做工的人，便沒有東西吃。」

這樣，不管推進勞動的力量是怎麼樣，反正經濟的不穩定已經社會化了。工人農民從實際的經驗裏知道思想家們所說的話，謂承認相互依賴，才能夠脫離貧窮和恐懼心。同時，他們也知道，贍養各人是一種權利，對這權利的承認，是社會最有力量的結合，像家庭中老早是這樣。他們把贍養各人當做共同的義務，結果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個人的責任心。兒童先鋒隊裏有一個教育的領袖，批評童子軍實行撲滿（Saving-box）的計劃為不當，他說：『兒童們應該毀滅這種情形，謂需要把錢存在銀行裏，以備「不幸的日子」的需用。因為有失業的清算（Liquidation of unemployment），我們用不着擔憂明天了。我們的國家現在正建設社會主義，各人都知道他是有前途的，因為他自己就在創造前途。』

利潤和財產

資本主義的世界，謂追求利潤的動機是它的大興奮劑。它把賺錢的精神當做主要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各派社會主義者和從前的基督徒，謂愛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最少，以社會而論，的確是這樣。所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利潤便失去法律上的效力，賺利潤的人被逐出，並且否認他的公民資格。現時蘇聯整個境內賺利潤的人大受責罰，外國人也許以為這是富農和小投機者受不當的追逐罷。

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們堅持在他們的國家裏，利潤的動機不能發展，因為利潤的來源已經取消了。照

馬克思的說法，這種來源是叫做剩餘價值。他也把地租和利息屬於同樣的來源。剩餘價值的觀念是根據各時代社會發展的分析。馬克思斷定一切價值是勞動產生的，因為在單純經濟的時代，生產者同時就是所有者和發賣者，價格的漲落完全以勞動的消費而定。所以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以生產時所消費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而定。在資本主義制度裏，勞動力也變成商品，資本家可以用同樣的標準把它購買回來。但是勞動者所產生的價值，比資本家所付的工資還多。工人再生自己勞動力的價值的時間，馬克思稱之為必需的時間，工人為資本家產生剩餘價值的時間，便叫做剩餘的時間。在這剩餘時間內所產生的價值，便是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歸資本家，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目的。社會主義者把這種提取剩餘價值的方法叫做剝削，那般取得剩餘價值的人叫做剝削者。

拉皮多斯 (Lapidus) 和阿斯托羅維特諾夫 (Ostrovityanov) 在他們合著的政治經濟學大綱裏 (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兼述蘇維埃的經濟學——指出這個明顯的事實：在蘇聯裏，產生剩餘價值的兩個主要條件——集中生產手段於資產階級和工資市場——不存在。工資還是照樣付，不過在蘇維埃制度下的人類關係，與工人在商品市場裏之出賣勞動力，實大不相同。在國營企業方面，工人把勞動力『拿給自己有關係的同等的勞工階級，因為這階級是一切國營企業的所有者。』真的，他有剩餘勞動，可是這剩餘勞動是拿來發展自己所有的和後來得享受的社會主義的工業，作那些對自己和兒子們有益的社會事業和文化事業，維持無產階級的國家，結果是有助於自己的階級。任何利潤都沒有

了。社會主義的剩餘勞動的出品，不是剩餘價值，而是叫做『剩餘出品』。這個名詞似乎不能令人很滿意，因為它沒注意到現存的交易。實際上，它或者可以叫做『社會的剩餘』。這是說，這種剩餘乃是一種超乎社會必要維持費的數目。這剩餘和資本主義經濟下所充作社會目的之需的淨益的剩餘，其間的差異是第一點，所需的分量是預先決定，且按一定的計劃去求得，第二點，它的求得和使用是由工人的指導，這指導的方法，下邊當詳加敘述。他們的剩餘，不是從人家隨意施與的紅利得來。

關於國家之佔領那般還沒有參加社會主義經濟，然而能夠享受國家經濟上社會上的利益的農民的剩餘出品，這兩位作者也有同樣的意見：『工人的國家把農民的一部分收入據為己有，不該視為剝削，因為無產階級獨裁制以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農業的合作和工業化——保障大多數小農民能夠發展到社會主義。』

在目前蘇維埃經濟的過渡時期，『價值律』能繼續發生作用，這一點也已經給他們指出。價格的制度還存在，只要俄國一定想與資本主義國家通商，那設計的人便不能絕對統制價格。但是爭點就在這兒：『價值律』逐漸變為『勞動消費』的律，這是說，按照所贊同的需要和標準，有意識地規定生產的關係。有人說，價值如果用來作有計劃的規定，它的本質便會毀壞了的確，計劃經濟會變換它的性質。這兩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既然把欲望當做思想的源泉，他們希望這形態也能夠完全變換。他們期望將來能夠取消貨幣和工資，把所消費的時間的長短定了一種勞動券（Labor Certificate），以作貨物和職務交易的

制度。

雖然如此，實際上利潤的動機因為沒有機會發展，逐漸趨於消滅。舊時攢營利潤的人既被逐出，新起的制度自然不讓他們的承繼人產生。其實，現時個人謀利潤的惟一機會，只有做糧食和衣服的投機事業。不過這種辦法一天危險似一天；第一點，因為社會主義的分配的增加，個人所經營的糧食貨物的商業便減少，因此價格的漲落非常的利害；第二點，因為這是違法。在最近的將來，這辦法會停止，不是由於法律之澈底強制，而是因為第二次五年計劃着重消費物的生產和改良分配的制度，使投機市場自動地歸於消滅。在最近黨的會議裏，莫洛托夫（Molotov）宣布『學習貿易』（Learn to trade）的口號，他的意思自然是想有效能地去組織分配。

最高限度的收入的原則，對於蘇維埃制度下的人民能夠發生效力，這不是由於法令的限制，而是由於實際情形。因此，沒有餘地作儲蓄。其實儲蓄並不需要，因為社會保險能顧到財政上的急需，同時兒童的看護和教育有公共的基金供給，所以，除授受一點個人的所有物外，遺產的習慣自然會消滅了。投機事業的利潤，生產資本的所有權，儲蓄的市場，都沒有存在的機會。在集體農場和工業上的獨立勞動組合（註）的方面，小生產者可以從自己所投的資本和會員費裏面抽一點利息，這事情不該視為例外。這不過是補助的收入，作小康的生活程度，不能變為資本主義的基礎。政府公債票——他們喜歡叫做『義務票』——的購賣，現在已發行幾次，每次為期十年，也是這種意思。他們使用同樣的方法和社會的壓力，實行了一

種戰爭時所用的自由公債 (Liberty Bonds)，這公債純粹是暫時的性質，以應目前的急需。共產主義者希望這些東西與金融經濟的一切方法和習慣都能夠消滅，並且希望購買這些東西的同情者們，不要視為儲蓄，須視為一種犧牲，以援助五年計劃。

(註)原文 (Industrial arte) 係俄國之獨立勞動組合，它的宗旨是：工作協同，利益均配。——譯者

為鼓勵那部分充滿着舊時謀利的心理的人購買公債起見，當局諸公恢復了舊制度下很流行的獎金的彩票。這些獎金全是付現，不必拿來生利息。他們以賭博的方法來分配獎金，所以分得不平均。購買者可以選定普通的利率，或者願意多得一點或少得一點。這是使用舊時的習慣，以增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利息。同樣地，那班存款於儲蓄銀行，作政府的資本的人，也可以得到利息。政府商業機關存款的付息，不消說是要鼓勵商業的效能。同時，資產階級的動機暫時能夠活動的範圍，很小心地把它限制了。最高度的獎金，逐漸從十萬盧布降為五千盧布了。社會的壓力，把勝利者的獎金百分之六十拿回捐助社會事業，而黨員所得的獎金則被本黨拿去。共同生活的發展，實際上使旁的利息變成不可能，因為各人的收入有限，不能夠購買很多公債票。尤其重要的是：大家都不想過寄生蟲的生活，而想過生產者的生活，大家趨於這種意見，謂要錢或有錢是愚蠢的事情。因為身心都健好的人，只贊成用心力得來的收入。

在蘇聯內，私有生產的資本之不可能，根本上把利潤的動機剷除了。工業機器歸於國家，百分之九十的分配機關也在國家的掌握中。至於土地，只有用自己的勞動力去耕種的人，才有要求使用的權利。一九